

苏共执政丧权亡党历史教训再探

——“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述要

2002年4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与会者都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专家,他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探讨和分析了造成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与教训。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因素很多,执政党的因素是根本的。苏共没有推进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国家法治化、社会文明化,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文化思想的多元性,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了垄断一切、凌驾于社会之上、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没有党内民主的政党,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脱离的道路,最后被人民所抛弃。归纳起来,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苏共衰亡的要害是自身肌体存在弊病长期不治,导致政治腐败。

苏共在执政之初实行的并不是一党制,十月革命之初是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后来由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及推行军事共产主义等措施上的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了政府,形成了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但左派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等仍合法活动,它们的代表还参加了1920年底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对推动布尔什维克改行新经济政策起了不小的作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取缔了其他政党。但是,列宁并没有得出社会主义只能有一个党的结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他还曾考虑过让孟什维克合法存在的问题。1922年底苏联才最终形成了一党独存的局面。没有其他党派的监督、参政、议政的一党制为最终走向僵化、专制埋下了隐患。

有学者强调,苏共失去政权是与其失去执政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执政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民众对政权的认同。这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予以解决的问题。近代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都召开立宪会议,通过选举建立政权。十月革命后也曾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但是,在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不占多数,布尔什维克解散了立宪会议。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用“和平、土地、面包”吸引群众跟自己走,在全俄工兵苏维埃二大上,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占了多数,因此,当时组成的政府是具有执政的合法性的。后来布尔什维克党成了唯一的合法政党,也是唯一的执政党。在没有全民选举的情况下,其执政的合法性主要靠方针政策正确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取得。后来,苏共多次发生重大的政策失误,多次出现合法性危机,成为其最后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苏共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把党变成了国家机关,党把大量精力用于直接管理国家,而不是放在对国家实行总方针的领导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上。列宁十分强调划党和苏维埃的职能,反对以党代政。斯大林当政后把党政合一,党领导和包办一切,1934年党的17大在体制上加强了以党代政。苏联共产党已不成其为先锋队组织,而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斯大林所建立的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国家的权力脱离人民,党的权力脱离广大党员,全部权力集中于党的机关,集中于机关的上层,集中于总书记个人手中。这种情况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加强了以党代政,他把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分成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党代政的状况得到加强,党政机构重叠,党的领导兼任政府职务普遍化,管理人员膨胀的现象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与会者认为,苏共执政后没有完成从一个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向领导建设的执政党的转变,没有实现党的民主化。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一是党内缺乏民主，民主集中制变成了官僚集中制、个人集权制。

民主集中制是相对于官僚集中制而言的。1906年4月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写入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包括：选举制、选出的机构可以更换、公开性、报告工作制等。但是，在高度秘密的地下工作状态下很难实现这一原则，布尔什维克实行的是严格的集中制，也正是这种高度集中的、有铁的纪律的党，保证了它所领导的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

夺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党内有了实现广泛民主的条件，布尔什维克也曾打算实行民主制。但是，不久便爆发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全国变成了军营，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实行党组织的“军事化”，实行“战斗命令制”，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定期报告工作制无法实施。尽管如此，列宁还是尽一切可能来运用民主机制，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性。即使烽火连天，也按期每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还不断召开中央全会，重大的问题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定。然而战斗命令制、集中制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所以战争一结束，实行党内民主问题马上提上了日程。

1921年春天召开的俄共第10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做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这种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等。工人民主制度工作方法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通过以前可以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但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10大的决议对党内生活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从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要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要把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作为一种制度，普通党员可以出席这种会议。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报告工作。上级党的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根据代表大会决议进一步做出的指示或指令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等等。应当说，这是苏联共产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关于党内生活准则、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好的一个决议。贯彻这一决议无疑能够防止个人专权。遗憾的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得到贯彻。

斯大林当政后，联共（布）成了一个高度集中、党内民主严重缺乏的党。斯大林甚至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中世纪的“圣剑骑士团”^①，不容许党内有任何不同意见，连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普通党员就更不必说了。党的政策的制定、重要决议的通过都是少数人说了算，加上党内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党的工作没有透明度，苏共作为一个政党已经很难从其成员处获得活力。斯大林提出的“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理论，不断地把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当作“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党，甚至肉体消灭。

苏共变成了一个官僚集权制、个人集权制的党，这种状况直到苏共解散都没有根本改变。苏共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决策失误，如30年代决定实行党内大清洗、由限制富农到消灭富农的政策转变、出兵阿富汗等，都是在个人专权或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下出现的，没有一种民主机制能予以纠正。

二是党的干部制度没有从任命制转向选举制。

有学者强调，苏共最大的腐败是政治上的腐败，表现为干部脱离群众，形成官僚特权阶层，他们高居于人民之上，滥用权力，支配着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命运。

在国内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转入新经济政策后，任命制并没有真正取消。从斯大林掌权开始，实际上完全实行“任命制”，只有“上了干部花名册”的人，才能成为各级管理人员。党不仅任命自己的干部，还任命政府部门的干部。任命制是苏联政治体制的

^① “圣剑骑士团”是中世纪专为掠夺和屠杀异教徒而建立的德意志天主教僧侣骑士团，它用血与火征服城掠地，铲除不顺从者。

要害，它使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和产生官僚主义，党本身蜕化成为机关利益的代表者。

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从事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特殊阶层，为了防止他们脱离人民、谋取特权和私利，必须有一套民主主体制作为保障，也就是要有民主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苏共本应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逐步还政于民，从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过渡到指导人民自己管理国家，通过民主选举把群众认可的领导人推向领导岗位，通过民主监督使他们为选民的利益服务，保证群众能罢免不称职的管理者。在苏共执政的70多年时间里，始终是党代表人民管理整个国家，干部由组织局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形成后来被叫做“诺名克拉图拉”的官僚特权阶层。据统计，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联盟一级的机关和部多达110个，苏联的行政管理人员已多达1860万人，民意测验表明，85%的苏联人认为他们不是在代表自己掌权，而认为他们只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工作人员。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苏共执政就失去了合法性。

三是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没有正常的机制，也没有任期制的限制，致使政策上的严重失误长期无法纠正。

苏共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更换最高领导人的制度，绝大多数最高领导人都老死在其岗位上。而一旦老的领导人死去，党内就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由于党内不存在公正公开的游戏规则，所以谁掌握了党的组织人事大权，谁善于玩弄权术，谁就能够取胜。从列宁逝世开始，党内领袖的产生大都不正常，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是在党内斗争中通过铲除异己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则是通过“宫廷政变”上台，是党内各派妥协的产物，此人对苏联的衰落与解体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上台则是通过暗箱操作，由政治局内的实力派决定。

列宁逝世前并没有指定接班人，也不可能指定接班人。列宁是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领导党和国家的，他在党内的最高职务是政治局委员，当时党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下设有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分别处理有关事务。列宁认为，党的领袖应该团结合作，实行集体领导。为避免党内分裂，他曾建议把性格粗暴的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

斯大林是在20年代党内斗争击败各派领袖后成为全党的领袖的，他与其他人相比占有明显的组织上的优势，既是政治局委员，又是组织局委员，还是书记处总书记，他控制着干部的任命和管理的大权，也决定着把什么问题列入党的会议议程。在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时，斯大林既利用了行政的力量，也借用了布哈林的理论力量；在战胜布哈林时，斯大林则主要靠的是行政组织力量。

斯大林去世后，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马林科夫担任了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副主席，赫鲁晓夫则专门抓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掌握着党组织的大权。那时掌握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的贝利亚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等人，利用他们对安全机构的恐怖心理，使用非正常手段搞掉了贝利亚（实际上贝利亚那时也提出过许多改革倡议）。此后国家形成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党政两巨头并立的局面。应该说，马林科夫是最早倡导改革的人，他正确地提出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来，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等，但是，赫鲁晓夫利用党组织的力量抵消马林科夫在经济改革中的倡导作用，1953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9月全会上接过马林科夫关于发展农业的方针，并成为党的第一书记。此后，赫鲁晓夫给马林科夫关于发展轻工业的主张戴上了违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在1955年1月中央全会上解除了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从而取得了党政最高领导权。鉴于斯大林时期干部终身制的严重弊病，赫鲁晓夫曾提出干部更新制度，但干部轮换过快，触犯了党内大批官僚的利益，终于被“宫廷政变”所推翻。

勃列日涅夫是苏联领导人中最平庸的一个，他没有政治抱负，不思进取，他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秘诀是满足官僚阶层的需要，在稳定干部队伍的口号下，使苏联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走向了停滞。苏联的衰败同勃列日涅夫的衰老戏剧性地同时发生。他和乌斯季诺夫等少数人决定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加速了苏联的衰落。

终身制导致了老人政治，病夫治国。接替勃列日涅夫的安德罗波夫，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体制的弊病，有改变现状的想法，可惜的是，他在台上仅仅15个月，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病床上领导国家的。安德罗波夫希望年轻的戈尔巴乔夫继承总书记的职位，但是政治局的老人们（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等）害怕失去

权力，联合选择了自己的人——年老体弱的契尔年科。水平和才干在这里并不起决定性作用，首先起作用的是“我们的人的利益”，是否能够贯彻“我们”的主张，保护“我们”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契尔年科甚至没有能真正挑起管理国家的重任，一年后就辞世了。三年内苏共死了三个总书记和一批政治局委员，人民对老人病夫领导苏联这个大国普遍感到无可奈何和失望，苏共的威信也因此大大降低。

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中是唯一的“年轻人”，全国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年轻力壮”的54岁的总书记身上，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让他们失望了。

苏共的领袖没有任期制，更没有正常的撤换制，这就使最高决策的失误无法及时纠正。邓小平在评价苏联政治体制时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国家权力个人化的问题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解决。总书记具有绝对的个人权威，是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最高权威，他的决策无论对错，从上到下只有服从。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身上，这实在太危险了。

四是缺乏监督机制。

苏共执政后逐渐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拥有无限权力，而其本身又不受任何监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设想未来社会的政治体制时强调行合一，反对三权分立，但列宁这一设想是以普选制为前提的，即通过普选，随时可以撤换官员来达到监督的目的，但普选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列宁晚年曾强调建立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但设想没有变成现实。斯大林执政后党的监督系统的权限日益缩小。1934年党的17大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联共（布）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其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取消了列宁时期监察委员参与和监督党委决策的权力。1939年党的18大又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其成员也不再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而改由中央全会选举，这样，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特别是最高领袖个人便处于监督之外。勃列日涅夫时期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使地方监察委员会完全从属于当地第一书记，地方党的第一书记也处于监督之外了。

国家机关有其自身的特殊利益，要使之兼顾各方利益，就必须有监督机制。苏共变成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又没有任何形式的监督和制约，党逐渐成了机关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造成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党权高于一切，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总病根”。

二、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搞思想文化专制，压制理论创新，使苏共不可能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者。

专家们一致认为，苏共的理论宣传工作极不成功，思想建设长期落后于实际，最终使苏共在各种思潮面前溃不成军。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苏共实际上推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缺乏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造成理论界只唯上、唯书，阻碍着理论创新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20年代苏联的文化思想是很活跃的，从30年代开始，苏联出现了思想文化专制的局面，在赫鲁晓夫时期有所放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进一步强化。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党的最高领袖拥有对真理的垄断权，全面控制信息的传播。

最高领袖握有对马列著作、言论的发表权与解释权，领导人的言论成了判断真理、是非的唯一标准，对于发表不同意见者，轻则进行政治批判，开除公职，重则被定罪，关进集中营，或送进精神病院。在20年代党内大争论中，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为名，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连恩格斯的著作《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在斯大林的反对下，也不能在苏联发表。对马列搞实用主义，有利于自己的，就拿来用，不利于自己的，就避而不谈，同时又不允许别人对他们的言论有丝毫的怀疑，要求把他们的言论当成教条奉行。在30年代，斯大林完全成了党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一个人的理论与思想成了一切工作的指针，一个人的头脑代替所有人思考，其他人只能诚惶诚恐地照本宣科。1938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材，而这部书充满对历史的伪造，是斯大林模式的百科全书。苏联出版的各种党史著作，都大肆吹捧当政的领导人。苏共只允许存在一种思想和方案，这就是领导人的思想和方案，领导人是各方面的权威，最

高领导人成为各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终裁决者，甚至自然科学的争论也要由总书记来裁决。在个人崇拜盛行、缺乏真正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地方，理论创新又何从谈起？！

第二，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大批判和专政的方式解决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问题。

在斯大林时期，主要用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成员时，提出把理论领域的争论与党内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指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发动“进攻”、“批判”。于是，在政治经济学、哲学、史学、教育科学、语言学和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大批判运动，许多人被逮捕，被非法审讯，被送进劳改营或被枪决。在斯大林的干预下，量子物理学说、相对论、关于遗传的物理化学原理的学说、谐振论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被宣布为“唯心主义”。控制论、逻辑学被宣布为资本主义伪科学。优生学、儿童学、应用心理学、个体生态学等被禁止研究。生物学被分为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批评斯大林所支持的农业草田轮作制者被处死。

在赫鲁晓夫时期，停止了非法逮捕、送劳改营和枪决，改用行政手段处理持不同思想者。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众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增多。外部世界对苏联形成了很大压力，国内对传统、保守的文化专制主义抗争的力量增强，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勃列日涅夫仍要维持封闭的意识形态，制造了一系列案件，监控和流放国外成了主要惩治手段。一些要求重新探讨十月革命的性质与意义、重新研究工业化问题、重新解读马列著作、重新审视苏联历史事件的学者受到打击。1967~1970年受克格勃监控的人达58298人，1971~1974年被监控的人有63180人，其中有些人被驱逐出境，有些人在出国访问时被吊销护照。

知识分子是文化科学知识的载体，没有他们就没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要求知识分子有独立思考、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苏共的上述政策和做法，不仅严重窒息了苏联社会，影响和阻碍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某些学科在苏联的发展，也使一部分知识分子远离了苏共。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了他们自由后，许多人便公开站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

第三，排斥和否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外的文化成果，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

苏共没有正确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过去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对于人们复杂的思想问题，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解决。苏共通过完整的政治宣讲系统和惩治系统，推广官方认为正确的东西。苏共不认可的任何思想与主张都被视为异端而进行扼杀。为此苏共建立了对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管理监督制度。在斯大林时期，除了政治局有人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外，主要意识形态工作和社会科学问题都由斯大林亲自抓。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由第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的制度。在对书报检查方面，实行严格的送审和事先检查制度，其程序是作者先自我检查，第二步是编辑检查，第三步是检查机关，即文献出版事务管理总局的检查；第四步是秘密政治警察机关的惩治性检查，由克格勃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由克格勃第五局实施；第五步是党的领导进行的意识形态审查。

进行书报检查的重要部门是文献出版事务管理总局，1938年它有15个处，其中仅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处就有525名检察官。检查的具体标准特别宽泛，“凡是政治上有有害的、思想逆己的，以及无思想性、敷衍塞责和歪曲苏联现实的作品”，都不能出版。1947年到1950年，共查禁了323本书稿、408篇文章和182首诗。在这样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下，任何有创新思想的幼芽都被摧残殆尽。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只能是赞扬和吹捧领导人，社会科学理论无法发展。这一文化体制紧紧地缠绕着社会肌体，使苏联社会失去了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1966年9月15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刑法第190条作了增补：其中第一项是“以口头形式散布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明显谎言，以及书面形式创作同样内容的作品，处以剥夺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劳动营改造一年，或处以100卢布的罚款。”克格勃通过监听、监控等严密监视一切有违上述规定者。

苏共不允许存在与官方不同的思想，而教条式的官方的理论与口号又往往不能回答实践中的问题，以致连宣传者自己也不相信。长期的封闭环境培养出来的文化，自然没有战斗力和免疫力，不堪一击。在戈尔巴乔夫允许其他思潮存在时，苏共的意识形态便很快崩溃了。

三、苏共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

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是一场民主革命。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与代表农民利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结成联盟，满足了农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后，却照搬了马恩建立在西方经济文化发达国家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所作的设想，试图在俄国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建立没有商品与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斯大林虽然在有限的范围内承认了存在商品与货币的必要性，但仍然否认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商品、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其计划经济始终具有很强的产品经济特征。这种脱离俄国政治经济实际的社会制度设计，导致了一系列理论失误，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

第一，这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导致了对农民政策的失误，把农民当成落后的小资产阶级予以限制和消灭，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虽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转改变了对农民的看法，提出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这种农民熟悉的方式逐步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但是，俄共（布）党内大多数人的观念并没有转变。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用强迫手段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作为私有者的农民。集体农庄这种组织形式并不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经济效益。苏联的粮食总产量直到1953年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在集体农庄里，农民不拥有生产资料，没有身份证，不能随便离开农村。5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的状况有所改善，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集体农庄的庄员也能拿到工资和养老金；但是，在集体农庄制度下，他们更加依赖国家，农业生产发展依然缓慢，经济效益只及美国的1/3至1/4，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开始大量从国外进口粮食。

第二，导致社会超阶段理论的发展。苏共是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却简单地照搬马恩关于共产主义分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的论断，把苏联社会与马恩的设想简单地对号入座。1936年11月，苏联刚刚摆脱饥荒，把生产资料从农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手中转到国家、集体手中，斯大林便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而当时社会现实是工农大众生活水平依然非常低下，不仅人均工业产值和国民收入远比美、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低，而且其人均生产和收入有些指数甚至低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三年后斯大林便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后又宣称一国可以建成共产主义。接着赫鲁晓夫又宣布苏联要在20年实现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虽有所后退，宣布苏联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但仍名不副实。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退到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但为时已晚。这一理论造成的严重恶果是大目标与现实严重脱节，使人们不再相信讲空话的苏联共产党。

第三，导致苏联经济理论的僵化与不切实际。苏共长期坚持的产品经济观，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是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而不能搞市场经济。苏共长期把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承认价值规律作用的要求，当成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这不可避免地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国家难以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从而使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巩固与发展，难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还有学者强调，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与实践存在严重的片面性。斯大林的工业化实际上是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苏联为了加强国防，把发展重点放在重工业上有一定的被迫性和必要性；但是，斯大林却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上升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方法，上升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征。这种片面理论使苏联人不敢冒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罪名，使苏联经济结构畸形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到苏联解体，苏联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都没有改变，1990年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占整个工业产值的73%，日常生活用品长期短缺，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苏联居世界第二强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也使人民对苏联式社会主义失去了耐心。

有学者认为，从斯大林开始，苏共一直自认为，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生命力的，而资本主义面临无法克服的危机（总危机理论）。为此苏联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军事工业，增强国防力量上，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名，大搞扩张主义。这一理论也妨碍了苏联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

第四，大规模的镇压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有学者强调，苏共执行这种脱离国情的模式，只能靠强迫命令，把不满者当成社会主义的异类、人民

公敌进行镇压。苏联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不满——镇压——更大的不满——更严厉的镇压……有的统计说，在整个斯大林时代有两千万人员遭镇压，上千万农民遭到剥夺，还有数千万人死于大饥荒。这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大镇压，大大削弱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埋下了严重的祸患。

四、一再错过改革时机和改革不配套，积重难返，导致剧变。

学者们认为，在苏联历史上，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曾不断向苏联提出改革的要求，也不断出现改革的机会，但苏共领导人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加上客观阻力，一再错过改革时机；有的是改革方针本身的缺陷导致效果不佳，有的则是当权者拒绝改革，使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体制与观念得不到更新，终于积重难返。

新经济政策缺乏政治体制的保障。1921年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这是苏联历史上第一次改革。这次改革意义重大，列宁通过新经济政策找到了一条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路，这一道路的核心是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农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没有顺应经济改革而进行改革，出现了政治与经济的不协调：经济上，苏联存在多种所有制成分，存在多个利益共同体，但是，在政治上仍然保持高度集中的体制，党政机关干部都由党的组织部门任命，党和国家政策的制定权完全集中在几个政治局委员，后来是斯大林一人手中。这就为斯大林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提供了体制保障。最后，不经全党讨论，1929年底斯大林个人中止了新经济政策，使苏联重新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了。学者们认为，中断新经济政策，转向斯大林模式，并不具有客观必然性。

卫国战争胜利后错过改革良机。斯大林模式本身具有严重弊端，卫国战争的爆发掩盖了苏联存在的国内矛盾与危机。大战期间，许多到过西方的军人、战俘、劳工看到西方并不象苏联宣传的那样腐朽，相反，那里人民的生活要比苏联好。他们强烈要求改革，到处流传着要解散集体农庄的传言，群众强烈要求把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到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上来。战争的胜利使苏联在国内外获得了空前的威望，出现了适时改革的客观良机。但是，斯大林却认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他所实施的那套制度的胜利，没有利用战争胜利的良机去改善国内的政治环境：增加民主，放松对政治生活的控制，给农民多一点自主权，改善人民生活，反而继续加强镇压，通过日丹诺夫在文化思想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利用安全机关接二连三地制造一个个莫须有的案件，使安德列耶夫“包产到组”的试验破产，主张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沃兹涅先斯基被镇压，继续与西方国家搞强硬的阵营对抗战略，不顾人民的生活贫困状况，集中物力和财力搞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直到斯大林逝世，这一政策才中止。

赫鲁晓夫的改革没能突破斯大林模式。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苏联提供了又一次改革时机，这时候改革斯大林体制已是苏联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普遍要求。贝利亚在内务部实行的改革和针对柏林起义提出的新方针，马林科夫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对乌克兰问题的处理方式，莫洛托夫起草的解决朝鲜战争的新方案，都表明改革或改变斯大林的方针已经在各个方面悄然兴起。赫鲁晓夫当政后，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继续进行了改革。

有专家强调，从客观上看，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向斯大林体制发起的第一次冲击，反对个人崇拜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但是，赫鲁晓夫的改革措施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反对斯大林不人道的镇压，但并不反对斯大林的理论体制，更谈不上摆脱斯大林的理论传统与体制束缚。赫鲁晓夫在20大上批判斯大林，只重点揭露了斯大林滥用职权、专横暴戾的镇压行为和苏德战争初期的失误，对20年代的党内斗争、工业化的偏差、农业集体化的错误、消灭富农、打击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等并未触及，实际上只触及了冰山的一角。对造成斯大林现象的体制根源，并未触及。

专家们认为，不能把苏联剧变的根源归之于赫鲁晓夫的改革。赫鲁晓夫并没有背叛列宁在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他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时间表，是斯大林在党的18大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方针的具体化。苏共22大制定的新党纲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共产主义文件，赫鲁晓夫仍强调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他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战胜资本主义，他仍然大力发展核武器，与美国抗衡。有学者指出：关于全民

国家、全民党的问题，早在30年代中期，苏联讨论并通过斯大林宪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作为现实问题提出来了。当时就有学者强调苏联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全体人民的国家，斯大林并没有对此表示异议。从此以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就越来越少了。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方面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一方面进行了大量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是很得人心的措施。但是，如果仅仅就事论事为某些公民恢复名誉，那么广大人民群众，甚至高级干部仍然会缺乏安全感。这就有必要从更高的高度论证国家政权的性质，把组织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职能提到首位，而把广大人民群众心有余悸的镇压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这在当时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因此“全民国家”理论在苏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全民党的问题是全民国家提法合乎逻辑的结论。不过就实际效果而言，全民国家、全民党的口号对苏联的政治生活并没有起多大的实际作用。赫鲁晓夫以及他的继任者们并没有从全民国家、全民党出发，采取切实的措施让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的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如果说赫鲁晓夫要为苏联剧变负责任的话，主要在于他的改革没有能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没有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找到一条新路。他未能像列宁当年那样把商品和市场作为经济改革的关键，“利别尔曼计划”的讨论随着他本人的下台而中断。

勃列日涅夫拒绝改革，也不许东欧国家改革，使苏联走近衰亡。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领导下，苏联还继续进行经济改革。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了东欧的改革浪潮，此后苏联自身的改革也中断了。勃列日涅夫满足于苏联表面上的歌舞升平，不再进行任何改革，整个社会靠着惯性在运动，经济发展速度连年下降。实际上，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是苏联改革的有利时机，全球化在加速发展，出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西方国家特别希望通过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联系，帮助苏联解决经济难题，借此软化苏联，缓解苏联的扩张势头；在苏联国内，继续赫鲁晓夫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无需承担冲击斯大林的风险，居民的文化素质和自主意识提高，知识分子队伍扩大，经济学界已有人提出改革的某些主张和方案。但是，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往前走，而是往后退；拒绝市场化改革，加强以党代政；强化意识形态的垄断性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驱逐持不同政见者；取消赫鲁晓夫的干部任期制和更新制，使特权阶层愈益强大，腐败愈益严重。从70年代中期起，勃列日涅夫健康状况恶化，讲话常常不知所云。这一时期苏联的特点是病夫治国，老人政治，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达到了70岁，这些缺乏生气、朝气的执政者怎么可能进行改革？国家的衰落与领袖老化有很大关系。专家们强调，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共走向丧权亡党的关键时期，勃列日涅夫也是苏共的掘墓人。

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又被党内的权势集团推为最高领袖，但他们重病缠身，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相继去世。这不仅延误了苏联的改革事业，也使党的威信威望大受影响。

戈尔巴乔夫改革措施失当，回天乏术，终于失败。戈氏上台之初把改革的目标定为：消除对历史的扭曲，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进行改革。不过，他显然缺乏具体而符合实际的设想，先在全国范围内搞轰轰烈烈的禁酒运动，实行加速发展战略，仍然没有跳出苏联传统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寄希望于用“计划加动员”的老办法解决经济问题。禁酒不仅导致了居民的不满，还使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税收损失，破坏了葡萄种植业和酒类生产。加速战略没有改变苏联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还使国家把大量用于进口日用消费品的钱用于购买设备，使商品短缺更加严重。在旧体制下“加速”不了，戈尔巴乔夫才转入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又遇到严重的阻力，受到党的机关阻挠，改革进行不下去，他转而求教于政治改革，以消除“障碍机制”或“制动器”。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开展政治体制的改革，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又不是从机关民主化做起，不是先改革党，而是先从群众民主开始，结果使整个国内局势失控，一步步地把苏联推向解体。

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推出“新思维”、提倡公开性和民主化，在一个长期实行高度强制、缺乏民主自由的社会里是一把双刃剑。戈尔巴乔夫显然不是一个高明的剑客，他所举起的剑既击中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又伤及了苏共和苏联本身。其实，苏联共产党早已失去了多数居民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不高明的改革没能使苏共重新取得合法性。最后，当叶利钦下令封闭苏共中央总部的时候，广大居民，包括苏共党员在内，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保卫苏共中央。

五、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导致人民对苏共产生信任危机，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

专家们认为，虽然在苏共执政时期苏联经济取得了不小的发展，但综合起来分析，苏联的经济建设是不成功的。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苏联经济呈现的是增长率递减的局面。由于苏联实行片面的追求高速度赶超战略，在一个时期里，其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西方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取得成绩的代价非常大，大量使用犯人劳动，牺牲人民生活）。由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其功效日益衰退，它的经济明显地出现了从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的过程。1990年经济出现危机，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下降2%、4%和3%，这使苏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出现扩大趋势。据俄一些学者分析，按人均计算1989年苏联的GDP为美国的30%，工业产值为42%，农业产值为38%。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苏联的实际GDP为美国的39.67%，人均GDP为美国的34.96%。苏联进行的70多年建设，并没有缩小沙皇俄国时期与美国形成的差距。

（二）落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经济效益低下，缺乏竞争力。苏联经济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经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它的经济仍是一种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这种经济在国际市场上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竞争时，必然被打垮。

（三）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实质上推行的是经济军事化政策，经济发展主要为扩军备战和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服务，是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1990年苏联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市场上“空空如也”。这种生活水平与其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苏联经济的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广大人民对由苏共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信任危机，人们自然会考虑这种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它的优越性何在？特别是当广大群众看到世界发展的真实情况，发现苏联大大落后的事实后，除了产生严重的屈辱感外，人们就会做出另一种抉择：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苏共，另找出路。

※ ※ ※

导致苏共失去政权的原因还有很多，如苏共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权，把人当成工具、零件，与世界民主化、人民要求自主的潮流相背离；苏共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不顾实际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都归为资产阶级的加以打击和排斥；自认为唯有苏联模式是最先进、最有生命力的，其余的模式则不应存在；苏共以扩展自己的模式为己任，以推广世界革命为名，奉行以实力对抗实力的政策，与美国争霸；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民都没有选择权和知情权，无法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等等。总之，苏共的根本问题是脱离群众，从一个代表群众的政党走上了脱离群众、与群众离心离德之路，最后丧权亡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借鉴与深入研究的问题。

（黄宗良、郑异凡、左凤荣、关贵海整理）

（特邀责任编辑：关贵海）